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兴起、进展与镜鉴

史 艳 赵可金

内容提要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在国际学界中颇具代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其战略需求,拉美政治研究在美国兴起。在冷战背景下,由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与现实政治发展密切联系。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表明,其核心争论在于普遍主义范式与相对主义范式的平衡,即拉美国家应追随和复制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还是应打破“依附论”观点下的中心外围结构保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冷战结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表明单一范式效度的有限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政治研究主要回答如何处理拉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尽管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存在价值立场和历史视角的偏见,但其研究经验仍值得借鉴。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区域研究 拉美研究 美国 拉美政治

拉丁美洲研究是美国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非西方区域/

* 史艳: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葡语学院博士后。(邮编:100089);赵可金: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邮编:100084)

国别研究中理论成果最为丰富的地区分支。自20世纪以来,除了以欧美发达国家为直接对象的研究之外,拉美研究是对接国际主流学界最为紧密、发展脉络最为清晰和理论成果最为丰富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在国际拉美研究中,美国的拉美研究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一个被严格界定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美国的拉美研究有着明确的定义和清晰的边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研究社群。其中,在各个学科的发展上,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最具代表性,主要体现在其理论成果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联。

21世纪以来,中国的拉美研究尽管取得了丰富成果,但在研究对象、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还有待深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郭洁副教授谈到,“中国的拉美研究当前面临着语言学习与地区研究联系不紧,多领域、跨学科研究未获应有重视,研究中偏地区轻国别、偏政策轻基础的取向明显等结构性问题”。^①郭洁比较了中日韩三国的拉美研究,在学术上指出一条研究拉美地区的重要路径,即通过与国际拉美研究学界的对话和交流,来发现中国拉美研究与国际拉美研究之间的差距,进而探寻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方向。中国拉美研究的发展,不仅需要比较中日韩的拉美研究,更关键的是从总体上把握包括美国、欧洲、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拉美研究界的研究范围、发展趋势和学科特点,从而确立中国拉美研究的学科景观。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推进中国特色的拉美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的任务。

本文通过梳理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兴起的背景,探讨区域国别研究作为跨学科领域的特性及与现实的关系。回顾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主旨更迭以及范式演进,本文所用材料覆盖拉美政治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作品,对其观点、代表范式做归纳,通过综述及例证对范式交迭过程中的本质问题开展论证。基于普遍主义、相对主义及全球主义三个阶段的划分,对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内容发展做出评价,对支撑其发展的学术网络做简要探索,并分析其对中国的拉美研究可能存在的启示。

一、美国拉丁美洲研究的兴起

拉丁美洲是一个重要的地区。从联合国的政治划分来看,拉丁美洲泛指

^① 郭洁:《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拉美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5期,第86—108页。

地理上以美墨边境格兰德河(Rio Grande)为界对美洲大陆的南北之分,将美国以南的美洲地区,包括墨西哥、中美洲、西印度群岛和南美洲等 33 个国家划入拉丁美洲,还包括仍处于美、英、法、荷统治下的 12 个未独立地区,面积达 2056.7 万平方公里,人口接近 6 亿。拉丁美洲概念的形成与欧洲殖民的历史密不可分。与欧洲人界定的近东、中东和远东等概念不同,拉丁美洲概念的缘起是由南美的欧洲移民后裔主导的。然而,同为欧洲殖民,拉丁美洲区别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另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在美洲大陆中部和南部已经形成了灿烂的古代美洲文明:阿兹特克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美国学者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从人类学、考古学等多个角度,阐释美洲原住民在欧洲殖民者到达前已发展出了高度复杂的文明。这些文明在不同程度上仍旧对拉丁美洲产生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在拉美社会中下层,土著居民的传统文化是拉丁美洲与北美洲文化差异的重要基因。^① 因此,拉美地区的发展尽管主要受到殖民时期的塑造,却不完全是西方的复刻,而是呈现不断变迁的文化景观。

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领域,美国的拉美研究是对拉丁美洲区域/国别进行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学术界公认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项理解他者的多学科协作推进的科学与事业,它有三个本质特征:首先,它是一项多学科和多领域协作研究,单一学科无法周延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综合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等众多学科和领域进行综合研究和交叉研究,如所谓的“国学”研究注定是多学科的文化研究;其次,它的核心是关于理解“他者”的研究,对本国的研究不被视作区域国别研究,如在巴西没有巴西研究、在阿根廷没有阿根廷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承认差异性,不管是现象的差异、还是内在的差异,实现对差异的理解、包容并就差异进行对话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宗旨;再次,它也是一项国家事业,仅仅凭个人兴趣无法承担起整个领域的前进,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实现某一国家意图,如战争的需要、国防的需要、外交的需要或者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可能是纯粹的文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只要满足上述条件,就可以定义成为区域国别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拉美研究是从某一国家需要出发,实现为理解拉美地区而进行的多学科和多领域系统研究,涵

^① [美]查尔斯·曼恩:《1491:前哥伦布时代美洲启示录》,胡亦南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6 年版。尽管萨缪尔·亨廷顿将拉美视作一种独特的“文明”,但却并没有对拉美文明的特性做出细致的分析。

盖地理、气候、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国际交流等众多领域。不同国家出于不同的战略意图和国家需要,在拉美区域/国别研究上必然呈现出不同的学术景观,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从议题覆盖范围来看,欧洲的拉丁美洲研究最初是指对拉丁美洲殖民历史的研究,即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到19世纪初起拉丁美洲国家先后独立。欧洲早期的拉美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的历史、古典文学作品和比较宗教研究上,研究议题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明显。不同的是,拉丁美洲研究没有面临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和非洲研究等区域研究存在的“东方主义”困扰,从一开始就没有过于强调古代历史和语言的问题,很多研究是在界限较为模糊的状态下自然发生的。拉丁美洲地区地理条件特殊,“气候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等成为早期拉丁美洲研究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拉丁美洲拥有较高比例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人口,欧洲学者的早期研究也多将拉美的落后归结于种族因素。^① 反映这一派理论,以及殖民研究相关成果的重要学术期刊为《拉丁美洲殖民研究》(*Journal of Colonial Latin American Studies*, JCLAS),期刊综合来自拉丁美洲、欧洲、加拿大及美国等地区学者的研究成果,横跨人文及社科领域所有学科,广泛收集与殖民相关的原创田野研究,旨在通过对殖民时期社会组织深入观察,为当代拉美研究提供扎实基础。^②

至19世纪中后期,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纷纷实现独立,除了“历史决定论”还在拉美研究中留有影响外,热带主义和种族决定论的研究思路纷纷失去光泽。与欧洲国家重视地理和人文历史研究不同,美国的拉美研究偏重于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对独立后的拉丁美洲的研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包括比如拉丁美洲国家的独立和国家形成、外敌入侵与边境冲突、经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等重要议题,对这一时期拉美国家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历史学界。美国历史协会中的拉丁美洲学者在1918年创立了季刊《西属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编辑部设在国会图书馆的西属美洲部门(Hispanic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自

^① Albert O. Hirschmann, “Ideolog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in Hirschmann, ed., *Latin American Issues: Essays and Comments*, New York: The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pp. 3-42; Paul Drake, “Latin America in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1492-1992,” in Roberto G. Rabel, ed., *Latin Americ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Dunedin, New Zealand: University of Otago Press, 1992.

^② 参见《拉丁美洲殖民研究》期刊介绍, <http://lasa.international.pitt.edu/sections/colonial/?pg=14>, 2019-06-14。

1936年起发布《拉丁美洲研究指南》(*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这是拉丁美洲研究在人文社科领域最早且权威的文献目录。^① 尽管早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领域,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快速发展。

在拉丁美洲作为独立区域研究分支的发展进程中,其主要推动力并不在知识界内部,而是在知识与社会需求的互动当中,美国在这种互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② 美国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地缘政治伙伴,拉丁美洲研究作为地区研究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对拉美的战略需求主导的。作为欧洲移民垦殖殖民地的一部分,美国自建国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不仅对欧洲没有兴趣,对非美国以外的西半球也漠不关心。^③ 孤立主义政策下的美国社会对于有关国外的知识缺乏需求,即便不乏愿意献身此类学术事业的学者,国际研究的整体发展十分缓慢。^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对拉丁美洲主要奉行的是“睦邻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即在政治上不干涉任何一个美洲国家的内政,在经济上奉行美洲国家之间的互惠贸易政策。不同于早期基于门罗主义的“大棒政策”,“睦邻政策”引导美国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和外交手段对拉丁美洲施加影响,在政治和军事上缓和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确保西半球在战时同盟关系。^⑤ 然而,1942年“珍珠港事件”的爆发空前地激励了美国国际研究的发展,对战略情报工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直接联系。^⑥ 战后,美国获得的历史性教训是,必须摆脱孤立主义,美国国内的国际学者因而联合起来,从国家利益

① 参见《拉丁美洲研究指南》在线资源, https://hlasopac.loc.gov/vwebv/ui/en_US/htdocs/help/index.html, 2019-06-14。

②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世界知识》2010年第9期,第64—65页。

③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American Isolationism in the 1930s,” *Milestones in the History of U. S. Foreign Relations*,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37-1945/american-isolationism>, 2019-06-14。

④ “在194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中约有15万教师,其中仅有200人左右从事与外国有关的研究……1900年美国大学在国际研究方面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仅为15名,同一数目到1940年也不过60名。”参见牛可:《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第64—65页;同时参见Robert A. 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⑤ “大棒政策”源于老罗斯福总统引用的谚语“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参见张文峰:《从门罗宣言到“睦邻政策”:兼论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指导思想》,《拉丁美洲研究》1986年第4期,第58—63页。

⑥ 战略情报局的研究分析处成为国际学者的汇聚之地,主任是哈佛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兰杰。战时新闻办公室招募了包括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克莱德·卡拉克洪、历史学家费正清及哥伦比亚大学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等。

角度,向联邦政府论证加强地区研究的必要性。^①由此,国家战略需要驱动了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国际研究中蔚然成风,其战略性和对策性研究特色也十分突出。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内区域与国别研究崛起浪潮的一个分支,拉丁美洲研究姗姗来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泛美联盟(Pan-American Union)的基础上,美国于1948年推动21个国家签署成立了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OAS),^②宗旨是维护地区和平与正义,促进区域团结,加强地区合作,共同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③事实上,美国主导建立美洲国家组织的重要战略意图是防止共产主义侵入美洲大陆。因此,直到1959年古巴革命的爆发和胜利,对拉美政治和美拉关系的研究才引起美国拉美学界的高度重视。古巴革命后,拉丁美洲对于美国的战略地位空前提升,为了限制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美国对该地区采取了所谓“楔子战略”。^④在该战略指导下的各项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手段,包括经济制裁、经济援助、政治结盟、武力干涉等,对拉丁美洲研究作为独立的地区研究分支提出全面要求,美国的拉美研究也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在美国拉美学界获得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协会为从事拉美研究的学者与机构建立了专业的学术网络,搭建了主要的研究和交流平台。该协会正式成立于1966年,由75位美国的拉丁美洲学者发起,宗旨是加强拉丁美洲相关的学术研究、研讨与教学等,通过公共辩论鼓励更广泛的公民参与。1972年前,拉丁美洲研究协会隶属于国会图书馆的西属美洲部门,而后,拉丁美洲协会很快被公认为美国国内最重要的独立地区研究组织之一。截至2015年,拉丁美洲研究协会注册会员已达到1.2327万人次,其中,5760

① “1945年12月,国家研究委员会、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以及史密森学院联合组建了‘世界各地研究考察委员会’。1946年,社会科学理事会建立了‘世界各地研究委员会’,目的之一是确定大学的现有设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政府在地区人才和特别训练计划方面的预计需求。”参见梁志:《美国“地区研究”兴起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10年第1期,第28—39页。

② 1948年4月,在波哥大召开的第九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States),时任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主导建立了美洲国家组织。

③ 参见美洲国家组织宪章, <http://www.oas.org/juridico/english/charter.html>, 2019-06-14。

④ “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指为战略目标的实现做出多方努力,通过加剧敌对联盟的联盟困境来分化或削弱对手,而非通过战胜对手来实现战略目标。参见 Timothy E. Crawford, “Wedge Strategy, Balancing, and the Deviant Case of Spain, 1940-1941,” *Security Studies*, Vol.17, No.1, 2008, p. 1; Timothy W. Crawford, “Preventing Enemy Coalitions: How Wedge Strategies Shape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5, No.4, 2011, p. 156。

人次定居在拉丁美洲,占总人数的 46%。在注册会员的学科背景方面,最集中的学科为历史学(11.87%),文学(11.45%),政治学(10.66%),社会学(9.35%),人类学及考古学(7.58%)。^① 美国的拉美研究学界,即围绕在拉丁美洲研究协会周围的学术机构和学者社群,成为美国研究拉美问题的主力军。考察美国拉美研究的发展趋势,实际上就是考察这一社群的学术产出和对话网络,基本上涵盖了美国拉美研究的主要轮廓。

二、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研究主旨与范式演变

从总体来看,美国的拉美研究在 20 世纪经历了重大的范式变革。其中,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是拉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观察美国拉美研究范式演进的重要窗口,主要致力于解释拉美政治发展的动力(比如民主化、民主巩固)、政治制度变迁(比如联邦主义、总统制)、政治行为体角色(比如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及其对公共政策制定,尤其是社会经济政策的影响。通过梳理拉美政治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反思拉美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面临的瓶颈和挑战,从而对拉美研究的未来做出审慎展望。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议题和方法论指标区分,20 世纪以来的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相对主义范式下的依附理论和全球主义范式下的多元理论:

表 拉美政治研究范式演进概览

| 指标 范式 | 时期 | 代表议题 | 研究方法 | 政治经济 理论 | 国际关系 理论 | 代表人物 |
|----------|----------------------|--------------------|----------------------------|----------------|------------------------------------|-----------------------------------------------------|
| 普遍主义 | 20 世纪 50 年代 末前 | 民族独立 现代化 民主化 | 实证主义 统合主义 宏大理论 研究 | 现代化理论 民主化理论 | 理想主义 现实主义 相互依存 帝国主义 理论 | 西蒙·玻利瓦尔 瓦伦祖拉 西摩·马丁·利普 塞特 加布里埃尔·阿尔 蒙德 |

^① 参见拉丁美洲研究协会 2014 至 2015 年度报告: <https://lasa.international.pitt.edu/eng/about/files/LASA-AnnualReport-2014-15.pdf>, 2019-06-14。

(续表)

| 指标 范式 | 时期 | 代表议题 | 研究方法 | 政治经济 理论 | 国际关系 理论 | 代表人物 |
|----------|---------------------------|---------------------------------------------------------------|----------------------------|---------------------------------------------------|----------------------------------------------------|-----------------------------------------------------------------------------------------------------------------------|
| 相对主义 | 20世纪 60年代 到90年 代 | 依附性积累 欠发达 威权民主 | 社会科学 研究 微观研究 定量研究 | 官僚—权威 理论 法团主义 理论 民粹主义 (民众主义) 理论 | 中心—外围 理论 依附性发展 理论 自治理论 开放区域主 义理论 | 劳尔·普雷维什 吉列尔默·奥唐奈 詹姆斯·马洛伊 安德烈·冈德·弗 兰克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 多斯 费尔南德·卡多索 奥斯瓦尔多·桑克尔 赫利奥·加瓜利伯 胡安·卡洛斯·普格 |
| 全球主义 | 20世纪 90年代 后 | 左翼政党 气候变化 跨国移民 跨文化贸易 技术转移 观念革新 性别研究 族群研究 | 中层理论 多元研究 | 新自由主义 民主巩固 新左翼政治 后现代主义 | 外围现实 主义 世界体系 理论 | 约翰·威廉森 卡洛斯·埃斯库德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马尔塔·哈内克 斯蒂夫·莱维斯基 坎尼斯·罗伯茨 黛博拉·雅舍 柯特·威兰德 |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 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

受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的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传统与现代二分,以及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社会演化阶段理论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化进程成为美国拉美研究的核心议题。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拉美地区在发展问题上长期受到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和单线发展模式的影响,呈现出普遍主义的范式景观。这一景观的核心特点是,重视检验西方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发展模式,认为导致拉美发展滞后的主要根源在于拉美国家的“内部障碍”,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成果成功检验了现代化的动力,拉美地区应全面追随西方现代化的道路。^① 美国国内学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兴起,为现代化理论在拉美的实践提供了理论

^① Peter F. Klarén, “Lost Promise: Explaining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in Peter F. Klarén and Thomas J. Bossert, *Promise of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6.

基础,通过将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的思想应用于人类社会,以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不可避免,这一过程中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① 基于社会单向演进的共识,现代化理论研究传统社会向以西欧、北美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过程,其提出的重要假设是,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完成现代化转型,即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存在时间上的先后次序,而不存在本质上的道路差异。^② 与此同时,针对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拉美现代化理论也基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验提出了相应的模型。^③

在现代化理论看来,一个国家现代化的社会进步取决于工业化、经济增长、民主化及其伴随的价值观念变迁。^④ 在这个方向上,许多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学者的研究重点关注工业化扩张带来的劳工运动崛起、民众日益上升的政治地位,以及不同类型威权主义政权的建立、民主转型的条件和发生模式。^⑤ 受美国政治学界的普遍主义范式影响,在经济学家看来,第三世界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走西方扩大资本积累、投资和促进企业家价值观的道路,复制美国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论,实行土地改革、出口导向战略。^⑥ 美国学界中现代

①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2.

② 参见 Talcott Parsons, Gabriel Almond, Karl Deutsch, James Coleman and Chalmers Johnson 等人的作品。

③ Gabriel A. Almond and James S. Coleman, *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Aldo Solari, eds., *Elit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Jacques Lambert, *Latin America: Social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0.

④ W. A. Lew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55;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Cyril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⑤ 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2, pp. 3-20.

⑥ Albert Fishlow, "The State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s," in Christopher Mitchell, ed., *Changing Perspectives in Latin American Stud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87-119; Joseph L. Love, "Economic Ideas and Ideologies in Latin America since 1930," in Leslie Bethell,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Vol. XI,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93-460; Joseph Love, *Crafting the Third World: Theorizing Underdevelopment in Rumania and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E. V. K. Fitzgerald, "ECLA and the 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Economic Doctrine," in David Rock, ed., *Latin American in the 1940s: War and Postwar Trans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 89-108.

化理论在政治学领域的代表人物是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在其代表作《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一书中,利普塞特的重要论断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产生。^①同时,民主政治的形成需要一系列其他社会条件作为前提,包括价值观、历史条件、社会制度等。一个国家在社会经济的各项条件上发展的越好,就越有可能支持民主制度。^②因此,拉丁美洲国家为实现政治上的现代化,必须在包括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本等方面发展成熟。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上的立场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政治现代化的目标是实现标准的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目标在冷战背景下,转化为对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类型的关注,^③关于如何能够在拉丁美洲国家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讨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成为美国主导的拉丁美洲研究在政治话题上的焦点问题。在这一潮流中,中国的拉美研究领域与之相呼应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拉美学科的奠基人罗荣渠教授,其围绕现代化理论的相关研究成为中国拉美学界在拉美现代化理论方面的重要推动力,其关于东亚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在学术上在范式上反映出普遍主义的立场。

在许多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学者看来,现代化理论在宏观经济领域的基本立场是,倡导自由开放的市场与通过全球化实现比较优势的最大化。普遍主义的范式在拉丁美洲经济模式上的应用,最典型案例是墨西哥在19世纪末期迪亚斯执政期间实行的外资政策,鼓励外国资本在墨西哥的基础行业进行大型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的发展。^④但外资注入带来的不平衡经济发展也引发了深重的社会危机,最引人瞩目的铁路行业在促进增长与有益发展之间的矛盾也在后来的研究中被不少美国学者所质疑,^⑤一系列社会冲突的复杂升级导致的最直观后果是1910年墨西哥大革命的爆发。两次世界大战的

①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Anchor Books, Vol.330,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63; John J. Johnson, *Politic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② Seymour Martin Lipset,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3, No.1, 1959, pp. 69-105.

③ Russell Fitzgibbon, "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Latin American Democrac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9, No.3, 1956, pp. 607-619.

④ José F. Godoy, *Porfirio Díaz, President of México, the Master Builder of a Great Commonwealth*, Londo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10.

⑤ John H. Coatsworth, *Growth Against Development: The Economic Impact of Railroads in Porfirian Mexico*, DeKalb, Ill: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时期,被认为是拉丁美洲社会被动选择的自主工业化战略时机,^①这一时期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后一阶段的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战后,各国将政治重心从国际冲突转向国际发展,拉丁美洲由于其特殊而具有优势的地理位置,吸引了美国众多跨国公司的注意,对于拉美作为潜力市场与在该地区的持续收益有很高预期。这一现实需求驱动的美的拉美研究开始关注拉美在战后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兴起,^②适应美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战略。无论是将拉丁美洲看作初级产品贸易的理想伙伴,还是看作培育新中产阶级的投资蓝海,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对拉丁美洲宏观经济的观察都是基于普遍主义范式,这一趋势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面临挑战。

(二) 相对主义范式下的依附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普遍主义研究范式开始受到动摇。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拉美的现代化进程致力于推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民主制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但拉美国家的实践经验并不符合学者们所预想的现代社会,反而呈现出更严重的社会混乱和更保守的威权政治。越来越多的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开始质疑现代化道路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来自不少拉美国家学者所倡导的欠发达理论、官僚—威权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等都是在致力于做出新的理论回答,他们加入了与美国拉美学界的对话,进一步拉高了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热度。

与现代化理论相比,依附理论在接受经济决定论的同时,却翻转了现代化理论的结论和逻辑,成为美国拉美政治研究重要的对话伙伴,其强大的理论批评声音也直接刺激了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依附论认为,导致拉美国家落后的根源不是来自现代化理论所主张的“国内障碍”,而是来自拉美被卷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后承受的不合理国际分工和不平等国际交换。在依附论看来,拉美国家采取欧美的现代化道路,其经济利润被“中心”发达国家夺走了,是导致有限发展或不发达的一个根源,结果上表现为拉美国家经济不发展、社

^① James Robinson,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2009 World Bank ABCDE Conference in Seoul, 2009, pp. 22-24.

^② John J. Johnson, *Politic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he Emergence of the Middle Secto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会不平等、政治不稳定和威权主义政治。^① 在依附论看来,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是内部阶级行为的决定因素。^② 拉美国家要想走出困境,必须发展自身独立的道路。因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试图以自身的多样化发展来摆脱依附地位,推进独立的现代化进程。

依附理论受到重视,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下属的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密切相关。1948年,联合国在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下设立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ECLAC),设立拉美经委会的主要目标是对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提出建议、提供援助并兼管实施。^③ 1950年,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成为拉美经委会的执行主任,随之,其与德国经济学家汉斯·辛格尔(Hans Singer)共同建立的“普雷维什—辛格尔假设”(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得到发展,^④基于大宗商品贸易逆差的宏观经济研究也进一步发展成为日后发挥巨大指导作用的依附理论。“普雷维什—辛格尔假设”针对拉丁美洲经济实践的理论解释是,由于初级产品的价格对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劣势影响会日益恶化,发展中国家对制成品的购买力将会逐渐下降,每单元初级产品的出口所换得的制成品的进口会不断减少,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贸易上采取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来创造自给自足发展模式的可能。^⑤ 普雷维什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比喻成为“中心”和“外围”国家,拉美经委会相应发布“中心—外围”

① Scott Mainwaring and Arturo Valenzuela, *Politics, Society, and Democracy: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② Paul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ia y Desarrollo en América Latina*, Mexico City: Siglo Veintiuno, 1969; Theotonio dos Santos, *Dependencia y Cambio Social*, Santiago: CESO, 1970;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Celso Furtado,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Osvaldo Sunkel,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Vol.22, No.1, 1973, pp. 132-176.

③ 参见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网站, <https://www.cepal.org/en/about>, 2019-06-14。

④ David I. Harvey, et al., “The 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 Four Centuries of Evidenc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2, No.2, 2010, pp. 367-377.

⑤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 Lake Success: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 1950; Raúl Prebisc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le Problems*, New York, 1950; Joseph L. Love, “Raúl Prebisc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Unequal Exchang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15, No.1, 1980, pp. 45-72.

理论的重要研究报告。在此报告中,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宏观经济提出了统御性政策指导,也就是接下来一个阶段拉美国家普遍实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倡导用国内制成品来代替进口产品,减少工业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以发展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

尽管依附理论派中大多支持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观点,但很多学者不尽赞成其渐进现代化的路径,转而强调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理论,主张进行激进的社会变革,对现代化理论和单线发展模型形成了更为有力的批判。连任两届巴西总统的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与恩佐·法莱托(Enzo Faletto)合著的《依附论与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欠发达理论的代表作品。^①两位学者认为,对于一个经济体系来说,若不能从其自身获得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动力,那么该体系便具有依赖性。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扩张最重要的两个元素:一方面是包括技术、器械设备在内的生产要素,另一方面稳定银行体系所能提供的金融支持。当资本主义经济体本身不具备这些元素时,自然地需要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寻求互补。“外围国家”即便能摆脱生产上的依赖性,也很难摆脱资本上的依赖性。因此,当“中心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的相互依赖结构,“外围国家”欠发达的状态是与“中心国家”的发达状态平行的,而不存在跟随后者的单线发展模型。换言之,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并保持发达的位置,是以发展中国家保持不发达状态为代价的。欠发达理论流派的其他重要学者还有安德烈·弗兰克(Andre Frank),^②以及塞穆埃尔·瓦伦素拉(Samuel Valenzuela)等。^③弗兰克进一步阐述了“中心”与“外围”的关系,认为“外围”地区在原材料和农产品生产中受自身条件(如天灾等)的限制,以及与“中心”国家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关

①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and Enzo Faletto,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② Andre Gunder Frank,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 in James D. Cockcroft, et al., *Dependence and Under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s Political Economy*, 1st ed., Garden City, N. Y.: Anchor Books, 1972.

③ Samuel Valenzuela and Arturo Valenzuela, "Modernization and Dependency: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10, No.4, 1978, pp. 535-557.

系,导致“外围”依附于“中心”,从而进一步论证了依附理论。^①

依附理论在政策上的指导立场是,与资本主义网络脱钩和重新谈判参与的条款(比如增加对跨国公司的征税)。“脱钩论”将国际劳动分工看作国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认为古巴革命是一个正确的战略。^②“再谈判论”则强调不平等交换可以通过有保护的工业化(进口替代战略)或控制外国资本来解决。“脱钩论”与“再谈判论”在更广的范围内,对亚洲、非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③即便如此,仍旧应当看到,虽然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和“欠发达”流派学者扩大了依附理论的影响,使得这些理论在政策层面有了直接的产出,但在政策实施上仍旧没有完全避免美国拉美学者所设定的普遍主义倾向。在拉美国家无差别的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策略,导致拉美国家外债激升,工业化进程不可持续并给经济社会带来巨大风

① Peter F. Klarén and Thomas J. Bossert, *Promise of Development: Theories of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6; Peter Evans, “Multinationals, State-Owned Corpora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perialism: A Brazilian Case Stud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26, No.1, 1977, pp. 43-64; Gary Gereffi, “Drug Firms and Dependency in Mexico: The Case of the Steroid Hormone Indust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1, 1978, pp. 237-286;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Stephen H. Haber, “Assessing the Obstacles to Industrialization: The Mexican Economy, 1830-1940,”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24, No.1, 1992, pp. 1-32; Jörg Meyer-Stamer, “Path Dependence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Persistence and Change in Three Industrial Clusters in Santa Catarina, Brazil,” *World Development*, Vol.26, No.8, 1998, pp. 1495-1511; Albert Hirschma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Albert Hirschm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Werner Baer,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Experiences and Interpretation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7, No.1, 1972, pp. 95-122; Patricio Meller, *The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Debate: Neoliberalism, Neomercantilism, and Adjustment Process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1.

② Paul A. Bara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New York: Marzani & Munsell, 1960; 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9.

③ Samir Amin, *Imperialism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7;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The Consumption of Dependency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12, No.3, 1977, pp. 7-24; Robert A. Packenham, *The Dependency Movement: Scholarship and Politic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The States, the Movements, and the Civilizations: Essays*, Cambridge; New York; Par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II: The Second Era of Great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1730-1840s* San Diego, California: Academic Press, 1989.

险,成为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①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忽视政治、社会等非经济因素有关,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学者通过将拉丁美洲与东亚地区的比较,得到的结论印证了相似的政策实施获得不同成效的关键变量,在于政治制度。^②

在依附理论的引领下,政治学学科内最有代表性的是阿根廷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其提出的官僚威权主义理论。奥唐奈认为,1960年起,南美国家政治生态中出现的威权现象,尤其是在秘鲁、智利、阿根廷、乌拉圭等国相继出现的军政府执政,是现代技术官僚与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并非传统的民粹主义或军人强人政治,基于此,奥唐奈将威权主义的这一分支总结为官僚威权主义。^③这一理论首先回应了利普塞特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即经济的发展、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并非必需地通向民主制度的建立,同时,这一理论回应了作为依附理论政策产物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在这样工业化的进程中产生的政治冲突,促使威权政治体制的发生,而在南美国家,这一变体是为官僚威权主义。^④奥唐奈的理论引起美国拉美学界关于经济发展的政治后果的讨论,就其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的学者包括卡多佐及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⑤

奥唐奈对拉美政治生态提出可替代的解释模型,而从整体上挑战拉美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该理论认为,拉美各国社会继

① Jeffrey D. Sachs and John Williamson, "External Debt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85, pp. 523-573.

② Jeffrey D. Sachs and John Williamson, "External Debt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p. 523-573; Francis Fukuyama, *Falling Behind: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Latin Ame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制度发展参见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1st ed.,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0.

③ Guillermo A.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④ Peter H. Smith, "The Changing Agenda f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Latin America," in Peter H. Smith,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pp. 1-29.

⑤ David Collier and 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Eduardo Silva, "Capitalist Coalitions, the State, and Neoliber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orld Politics*, Vol.45, No.4, 1993, pp. 526-559; Hector Schamis, "Reconceptualizing Latin American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1970s: From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to Neo-conservatism,"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23, No.2, 1991, pp. 201-222; David Collier, "Overview of the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 Model," in David Collier, ed., *The New Authoritarianism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9-32.

承了独特的伊比利亚传统,有着强大的封建社会关系、反资本主义的偏好和动机、世袭的扩展家庭、等级化的罗马天主教式的宗教亲缘关系、法团主义,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威权主义与垂直的治理结构等特征。由于这些制度特征并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消失,决定了拉美国家独特的发展路径,呈现出伴随着天主教文化和哲学框架,强大、积极和干涉主义的由拉美国家传统决定的非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与发展逻辑。^① 尽管不少美国拉美政治学者运用法团主义理论分析拉美地区的垄断、等级化和国家主导的利益集团政治现象,但并没有产生多学科的连锁反应。

依附理论对现代化理论结构性挑战,欠发达理论及官僚威权主义基于拉丁美洲的地区特殊性进行的理论创新,代表了相对主义范式在拉美研究学界的发展,也刺激了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相对主义趋势。相对主义理论发展的前提是承认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而打破普遍主义理论中的一般性假设。比如,学者在分析拉丁美洲的军政府执政时,总结出“新旧专业化”的区分,^②认为官僚威权主义中的军政府,与传统意义上的强人政治有区别,军队作为原本功能单一化的组织,表现出新的职业化、专业化的特点,作为国家宏观政策的执行者,接管国家治理。^③ 再比如,市场经济模型的一般假设在拉丁美洲也受到挑战,本·施奈德(Ben Schneider)提出,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化市场经济(Liberal Market Economy, LME),以及以英国为代表的协调式市场经济模型(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CME),拉丁美洲市场经济是一种等级制市场经济(Hierarchical Market Economy, HME)。^④ 等级制市场经济具有四个特点

① Richard M. Morse, "The Heritage of Latin America," in Louis Hartz, ed., *The Founding of New Societi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4; Howard J. Wiarda, ed., *Politics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The Distinct Traditi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4; Claudio Veliz, *The Centralist Tradition of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hilippe C. Schmitter, *Interest Conflict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Braz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David Collier, "Trajectory of a Concept: Corporat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Peter H. Smith,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5, pp. 135-162。在下文中,我们不再具体讨论法团主义相关内容,因为在跨学科影响力上,法团主义概念影响力不及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

② 新旧专业化的区分即"New professionalism" and "Old professionalism",参见 Alfred Stepan,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of International Warfare and Military Role Expansion," in Alfred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pp. 47-68。

③ Alfred Stepan,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of International Warfare and Military Role Expansion," in Alfred Stepan, ed., *Authoritarian Brazil*, pp. 47-68。

④ Ben Ross Schneider, "Hierarchical Market Economies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41, 2009, pp. 553-575。

即商业组织的多样性、跨国公司的统御性影响、劳动力普遍技能较低和松散的劳工关系,这些特点适应极差式社会结构而产生,继而维系等级制市场经济。^①这一理论回应了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中制度因素的积累,解释市场经济的变体中又一种解释模型,挑战以市场经济的一般假设,极大地冲击了主导拉美经济发展规律的普遍主义范式。

(三) 全球主义范式下的多元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依附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社会主义主张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拉丁美洲的发展困境。在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推动下,拉美各国政府重新采取消除贸易壁垒、增加比较优势、推动公共部门私有化改革和降低外资进入门槛的政策,依附经济理论逐渐被新国际货币主义替代。同时,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案例也令带来沉重债务负担的进口替代战略备受怀疑,^②让拉美各国转而青睐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拉美关系的推进,更加刺激了“不一样的拉美研究”。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拉美研究学界开始反思依附理论,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及其成效问题,关注拉丁美洲社会对这一系列改革的适应情况。

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在拉丁美洲的回潮和发展,与美国在拉美研究作为学术领域的统领地位直接相关,受到美国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直接驱动。最有代表性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的“芝加哥弟子”(Chicago Boys),指的是一批拉丁美洲经济学者,以智利籍为主,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接受教育,师从以弗里德曼和哈伯格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派学者,培养这批学者成为行为主义理论的推动者,将政治研究去政治化,发展了包括系统论、长圈理论等众多观点。回到智利后,这批“芝加哥弟子”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开设经济课程,他们共同代

^① Ben Ross Schneider, "Hierarchical Market Economies and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Latin America," pp. 553-575.

^② Frederic C. Deyo,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Asian Industri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Jonathan Brown, *A Socioeconomic History of Argentina, 1776-18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aul Drake, *The Money Doctor in the Andes: The Kemmerer Missions, 1923-1933*,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Joseph L. Love and Nils Jacobsen, eds., *Guiding the Invisible Hand: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the State in Lat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Praeger, 1988.

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对南美各国当时的宏观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① 美国以宏观经济的稳定为由,对智利1973年至1990年间皮诺切特军政府的支持,体现出美国在这一时期对拉丁美洲的态度,以保证共产主义的零扩散为基本原则,以宏观上发展自由经济为重要目标,这两大目标的根本逻辑是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的应用,混合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中两极格局造成的特殊影响,共同促使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对于拉丁美洲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施加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经济领域关注焦点由保护主义转向开放主义,政治领域开始关注民主化转型的问题。^② 这一时期的美国拉美政治研究开始放弃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阶段的宏大理论和结构决定论倾向,转而关注行为体的动力、意识形态的角色、政治意愿问题及博弈论等问题,民主开始成为领导人的政治目标、公民社会的公认成就,而不再是经济发展自然产生和必然带来的结果。^③ 关于政治不稳定与民主巩固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主流。^④ 这些研究也鼓励了新葛兰西主义文化与权力理论在拉美政治研究中的运用,学者们开始聚焦拉美性别政治研究、族群政治研究及文本政治研究等问题,本土社会行为体的兴起和新左派的兴起,尤其关注外部行为体对拉美内部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问题。^⑤ 与此同

① 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2007.

② Guillermo O'Donnell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Tentative Conclusions about Uncertain Democrac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Adam Przeworski,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③ Kenneth Bollen and Robert W. Jackman,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0, 1985, pp. 438-457;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2.; Samuel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OK: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Mitchell A. Seligson,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Current Cycle," in James M. Malloy and Mitchell A. Seligson, eds., *Authoritarians and Democrats: Regime Transition in Latin America*, Pittsburgh, PA: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7.

④ Juan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1, 1990, pp. 51-69; Arturo Valenzuela, "Latin American Presidencies Interrupted,"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5, No.4, 2004, pp. 5-19.

⑤ Peter Evans, *Dependent Development: The Alliance of Multinational, State, and Local Capital in Brazi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phan Haggard, *Pathways from the Periphery: The Politics of Growth in th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 Kaufman, eds.,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Adjustment: International Constraints, Distributive Conflicts, and the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拉美地区自由经济与政治民主的一致性关系,经济学家们欢呼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增长,而政治学家则关注民主转型和巩固、新民主国家的民主质量、去中心化趋势,以及新制度的功能所带来的社会绩效。^①全球主义趋势驱动下的学术研究发展了全球力量和地方条件的互动研究,跨边界研究带来了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和欧洲国家拉丁美洲人文历史研究的融合,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通过共享形成有效的对话。然而,冷战后的拉美国家依然不断偏离学界期望的路线,面临着大量新的挑战。

在全球化背景下展开的学术争鸣,美国的拉美研究呈现出全球主义关照下的多元研究景观。尤其是经历“粉色浪潮”以后,美国学界围绕拉美研究的前进方向展开激烈讨论,对区域研究的批评在于其过多关注单个区域,而忽视更大的全球和跨区域过程对单个国家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区域研究的全球路径提供了理解拉美区域的大规模过程,比如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帝国扩张运动、跨文化贸易、生物交换、技术转移、观念拓展,以及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扩展等议题。在这场争论中,以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荣誉教授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M. Ster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在全球化冲击下,区域研究和所有学科一样都服从于政治发展的需要和知识市场的变革,全球主义成为吸引眼球的研究主流。^② 还有一些激进学者甚至认为,区域主义研究模式不仅会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会彻底转型,因为冷战世界的结束标志着全新世代的到来。全球主义范式景观下的拉美政治研究不容忽视多远文化差异,多文化的差异特征仍然是美国拉美区域研究的核心关切,未来美国拉美研究的发展势必更加关注文化特质问题,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兴起的关键内核所在。尽管还有一些拉美研究中区域性的维护者,不可否认的是,全球主义已经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后美国拉美研究的主流。

^① Larry Diamond, et al.,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atin America*,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9; Jorge I. Domínguez and Abraham F. Lowenthal, eds., *Construct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New South American Democracie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Dietrich Rueschemeyer, Evelyne Huber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Robert M. Stern,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2009.

20世纪90年代后,多学科互动成为潮流,但没有居于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①在学科发展上拉美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方法论上呈现中层理论倾向,^②这些特点还表现在超越作为国别/区域研究的拉美研究而推动的后现代主义拉美研究上。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拉美政治出现了明显左转的“粉色浪潮”倾向,数国相继出现大量左翼或中左翼的民选总统。^③最突出例子是在卢拉领导下的巴西,应运而生的关于新左派政治的研究也如火如荼。^④关于为什么会有拉美向左转的现象,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讨论与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高失业率、腐败、通货膨胀和日益上升的不平等相关。^⑤然而,拉美向左转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传统的左翼政治,新型左翼政府的确具备更加民主、多元、包容的特征。^⑥此外,在全球化推动下,新一轮开放区域主义研究也十分活

① 社会学领域的讨论参见 Alejandro Portes, et al., *Latin American Sociology in the Mid-1980's: Learning from Hard Experienc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Daniel H. Levine, "Paradigm Lost: Dependence to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40, 1988, pp. 377-395。

② Alejandro Portes and A. Douglas Kincaid,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Critical Challenges and Empirical Trends," *Sociological Forum*, Vol.4, No.4, 1989, pp. 479-503, 499。

③ Jorge G. Castañeda,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Foreign Affairs*, Vol.85, No.3, 2006, pp. 28-43; Jorge G. Castañeda, *Utopia Unarm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 Roberts, ed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Sebastian Mazzuca, "The Rise of Rentier Popu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4, No.2, 2013, pp. 108-122; David Samuels, "From Socialism to Social Democracy: Party Organiz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ers' Party in Brazil,"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37, No.9, 2004; Kurt Weyland, "The Rise of Latin America's Two Lefts: Insights from Rentier State Theor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1, No.2, 2009, pp. 145-164;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4, No.1, 2001, pp. 1-22; Sebastian Edwards, *Left Behi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opu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④ Wendy Hunter and Natasha Borges Sugiyama, "Democracy and Social Policy in Brazil: Advancing Basic Needs, Preserving Privileged Interest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51, No.2, 2009, pp. 29-58; Maxwell Cameron,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s: Beyond Good and Ba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0, No.2, 2009, pp. 331-348; Kenneth Roberts, "Chile: The Left After Neoliberalism," in Levitsky and Roberts, ed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25-334; Heraldo Muñoz, *The Dictator's Shadow: Life Under Augusto Pinochet*,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⑤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World Bank Group,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Breaking with History?* Washington, D. C., 2003。

⑥ Jose Natanson, *La Nueva Izquierda: Triunfos y Derrotas de los Gobiernos de Argentina, Brasil, Bolivia, Venezuela, Chile, Uruguay y Ecuador*, Buenos Aires: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2008, p. 276; and Castañeda, 2006, Levitsky and Roberts, 2011。

跃,推动着拉美区域一体化理论的发展与革新。^① 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单一理论范式已经不足以概括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全貌。

三、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的进展与评价

回顾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的学术发展史,普遍主义范式与相对主义范式的博弈推动了美国拉丁美洲研究领域的发展,两者又在全球主义范式的推动下进入到多元发展的新阶段。事实上,普遍主义范式和相对主义范式的区分,主要在于究竟应该强调地区的特殊性还是强调理论的普适性,应该试图去解释所有现象还是充分了解现存的个例。这样看来,两者的区分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没有本质区别,殊途同归。归根到底,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拉美与世界的关系,究竟是选择归属欧美发达国家之路还是寻找拉美区域自我发展之路,这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争论。

在这一核心问题的争论中,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的拉美政治学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20世纪80年代是近年拉丁美洲发展的一个节点,地区性债务危机的爆发宣布普遍主义的胜利。1982年,墨西哥宣布主权债务破产以后,地区内其他国家的信用评级纷纷跳水,在突发的债务危机下,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美国主导的多边机构介入,挽救了局面。优惠贷款和援助的交换条件,是拉丁美洲严格实施结构性改革,这一系列政策指导原则又称为“华盛顿共识”。^② 债务危机背后金融体系的崩溃,是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

^① Briceno-Ruiz, "Strategic Regionalism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Triangular Relation Between the US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23, 2001, pp. 199-213; Briceno-Ruiz, "Strategic Regionalism and Regional Social Policy in the FTAA Process," *Global Social Policy*, Vol.7, 2007, pp. 294-315; Sanahuja, "Del 'Regionalismo Abierto' al 'Regionalismo Post Liberal'. Crisis y Cambio en la integración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in Martínez Alfonso, L., Peña, L. and Vázquez, M. eds., *Anuario de la Integración Regional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Gran Caribe 2008-2009*, Buenos Aires: Coordinadora Regional de Investigaciones Económicas y Sociales-CRIES, 2008; M. P. Riggiorzi, "Region, Regionness and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Towards a New Synthesis,"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7, 2012, pp. 421-443; M. P. Riggiorzi and D. Tussie, "The Rise of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in Riggiorzi, P. and Tussie, D. eds. *The Rise of Post-Hegemonic Regionalism: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Dordrecht: Springer, 2012.

^② John Williamson, "What Washington Means by Policy Reform," in *Latin American Adjustment: How Much Has Happened?*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pp. 7-20.

的直接后果,^①在这样的情形下,依附理论主张的自主发展和工业化模式不攻自破,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再次强势回归地区研究,成为指导宏观经济的统御性原则。然而,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20世纪80年代并没有结束拉丁美洲的危机处境,“华盛顿共识”的推行没有带来明显的经济好转,以玻利维亚为首的国家通货膨胀超出控制;到20世纪90年代,整个地区的贫困率和不平等程度甚至有所增加,同时,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相继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引起的剧烈政治回响,在刚刚建立起的民主制度下,使得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态再次发生地区性变化。一批新左派政府在拉美国家的上台,引起美国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②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丁美洲没有取得理论上假设的效果,再次鼓励了相对主义范式的发展,促进了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对于拉美社会现实的重新考量,在这个过程中最迫切的是,回应贫困与不平等问题,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和设计。^③

显然,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作为专门及专业的地区研究取得了极大发展,普遍主义范式与相对主义范式的博弈成果,以及在发展道路上经历的地区性地起与落,说明了任何一种范式都不足以为地区发展提供唯一答案,而正是因为二者交替地占据统御性地位,对政治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产生带有明显偏向性的影响,使得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不适应尽显,出现这样的局面的成因复杂,包括政治动因、社会基础和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的外部影响等。^④无论就其学术范式而言,还是就其政策思路而言,拉美地区在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两种范式间的摆动,不仅成为美国拉美学界的困惑,也构成拉美地区各国战略走向的困惑。这种困惑并非拉美研究独有,其他区域研究也不同程度的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相比其他区域与国别研究,美国拉美研究所取得的学术进步的确不容低估。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 C. W. Calomiris and S. H. Haber, *Fragile by Design: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Banking Crisis and Scarce Credit: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Banking Crisis and Scarce Cred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Chapters 10-13.

②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Robert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③ Evelyne Huber and John Stephens, *Democracy and the Left: Social Policy and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④ Donald Bray, “A New Latin Americanist Pedagog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31, No.1, 2004, pp.10-22.

一是理论轴心。相比其他区域研究,美国的拉美研究在理论贡献上十分突出,社会科学领域普遍接受的诸多关于发展中地区研究的重要概念、基本理论和理论命题得以生成、修订和校验的重要来源都是拉美区域研究。^①例如,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依附论的研究、社会运动的研究、“华盛顿共识”的研究、^②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研究、^③军人干政的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官僚威权主义等,^④都来自于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相比之下,美国的拉美区域研究是理论水平最高的区域研究之一,这对其他区域研究具有很大借鉴意义。美国的拉美研究受到学界流行的理论驱动分析的强烈影响,在理论建构上有不俗表现,如社会学中的世界体系理论,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性选择理论,文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中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等。在政治学中,这些理论涉及民主类型、不同制度结构的政治后果、社会运动、性别政治和公民权等问题。^⑤在经济学

①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Juan J. Linz and Alfred C.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Susan Carol Stokes, *Mandates and Democracy: Neoliberalism by Surprise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Anthony W. Marx, *Making Race and N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eatriz Magaloni, *Voting for Autocracy: Hegemonic Party Survival and Its Demise in Mexic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Evelyne Huber and Fred Solt,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Neoliberalism,"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39, No.3, 2004, pp.150-164; Michael Walton, "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Good, Bad, or Incomplete,"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39, No.3, 2004, pp.165-183.

③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 2002, pp.5-21; Patricio Silva, "Technocrats and Politics in Chile: From the Chicago Boys to the Cieplan Monks,"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Vol.23, No.4, 1991, pp.385-410.

④ Guillermo O'Donnell,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⑤ Guillermo O'Donnell,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5, No.1, 1994, pp.55-69; Juan J. Linz and Alfred C.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David Collier and Ruth Berins Collier,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cott Mainwaring and Timothy R. Scully, *Build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 Shugart,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Joe Foweraker and Ann L. Craig, eds., *Popular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Mexico*,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0; Arturo Escobar and Sonia E. Alvarez, *The Making of Social Movements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Sonia E. Alvarez, *Engendering Democracy in Brazil: Women's Movements in Transition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Jane S. Jacques, *The Women's Movement in Latin America: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Elizabeth Jelin and Eric Hershberg, eds., *Constructing Democracy: Human Rights, Citizenship, and Society in Latin Americ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领域,学者们普遍关注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但并非所有人都接受新自由主义和芝加哥正统派的经济学,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着明显的学术话语霸权,但实用的新结构主义也很有市场,强调更加灵活的国家干预角色。在社会学领域,围绕资本与技术为中心—外围分化中流动、文化形式在全球规模的复制、阐释社会网络、叛乱和革命的原因、社会运动的演变,以及世界经济中的劳工管制等话题,展开了大量的专题比较研究。^①可见,美国的拉美研究在众多学科领域都有不凡的理论产出,这是美国的其他区域研究所难以相比的。

二是兼收并蓄。从兴起之时,美国的拉美研究没有“东方主义”的困扰,对各种学术范式保持开放态度。^②相比其他区域研究,美国的拉美研究也是融入国际学界最充分、衔接最紧密的,其中,重要原因是拉美国家的拉美研究学术社群与美国高度重合,甚至在拉美研究的很多议题领域更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学者占据话语权的。美国的拉美学界有着比其他区域研究更大的学术影响力。为实现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成分的政治目的,美国培养了一批顶尖的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学者,以名义上“去政治化”的立场控制拉丁美洲的宏观经济政策,进一步对政治形势施加直接的影响。^③在政治上引导拉丁美洲国家像北美的自由主义民主发展,经济上倡导自由市场和开放投资的模式,两个角度综合起来,促成了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争取进步联盟”的对拉政策。本质上,“争取进步联盟”是偏重维护美国在拉美的经济利益而采取的策略。^④随着冷战升级,以及古巴革命影响下以中美洲尼加拉瓜为代表的政治动乱增加,美国“去政治化”地区友好政策难以为继。因此,拉美研究的学术中心在美国,

① Susan Eckstein, ed., *Power and Popular Protest: Lati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Elizabeth Jelin, ed., *Los Nuevos Movimientos Sociales*,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erica Latina, 1985; Elizabeth Jelin, ed., *Women and Social Change in Latin America*, London: Zed, 1990; Alejandro Portes,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5; Alejandro Portes, Manuel Castells and Lauren A. Benton, eds.,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Richar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33, No.6, 1990, pp. 712-732, 724.

③ Donald W. Bray, “A New Latin Americanist Pedagogy,”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31, No.1, 2004, pp. 10-22.

④ “争取进步联盟”是肯尼迪政府实施的大约223亿美元的政策项目,旨在修复包括贫穷、文盲、不平等在内的社会疾病,而这些社会问题被认为是可能导致共产主义在地区蔓延的动因。参见 Tony Smith,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the 1960s,” in Abraham F. Lowenthal, *Exporting Democracy: The U. S. and Lat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71-89.

拉美研究学界与美国学界的对话非常紧密。此外,受到地理、语言、宗教和历史政治联系紧密的影响,北美和拉美之间学术合作不像东亚、中东和非洲那样障碍重重。拉美研究充分吸收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传统,融合各方的文明营养,北方的现代化理论、民主理论与南方的依附理论、民粹理论相互交织,北美学者开始关注阶级冲突和阶级平等的话题,南方学者也讨论性别平等和民主稳定的话题。在方法论上,北方关注的定量分析和自由主义与南方关注的定性分析和马克思主义交映成辉。美国的拉美研究学界注重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据统计,从1969年到1989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拉丁美洲研究分会一半以上的资助给了拉美研究学者。^① 拉美研究影响美国研究关注历史和结构因素,而美国研究则影响拉美研究关注经验研究和定量研究。

三是与时俱进。美国的拉美研究保持了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在不同阶段,关注的问题不同,理论回答也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法。从学术范式来说,自20世纪以来,围绕拉美地区的政治走向选择,拉美政治研究主要呈现出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的景观。在关于拉丁美洲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议题上,普遍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博弈推动了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不断地重新定义着拉美政治研究的议题领域和学术范式。其中,普遍主义范式在早期的拉美研究中盛行,主要体现在现代化理论对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战略产生的影响。20世纪中期依附论在拉丁美洲的发展,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挑战,但在政策影响上仍旧具有普遍性的倾向。拉丁美洲学界对主流理论的回应,促进了相对主义范式的发展,基于拉丁美洲的现实,提出欠发达理论、官僚威权主义理论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解释模型。然而,20世纪80年代空前的债务危机使得相对主义范式受到挑战,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在20世纪90年代的广泛实施,象征着普遍主义范式的回潮,但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拉丁美洲遭遇挫折,又

^①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 in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 202; Vicente L. Rafael, "The Cultur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Text*, Vol.91, No.111, 1994; Paul Drake, "From Retrogression to Resurgence: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Relations with Latin America in U. S. Universities, 1970s-1980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S-RC/CLACSO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Scholarly Rel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Montevideo, Uruguay, August 15-17, 1989.

引发了美国拉美学界对普遍主义进行新一轮的反思。在方法论上,拉美研究也从早期的人文和描述性方法越来越具有严格的科学方法论武装。早期的拉美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和文学领域,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和政治学开始取代历史学的地位,^①并在研究内容上关注现代化理论和依附理论,运用基于经济决定论的整体主义解释。

战后以来,美国的拉美研究体现出理论轴心、兼容并蓄及与时俱进的积极进步,但与此同时,难以摆脱片面之处。美国的拉美研究受到美国霸权立场的决定性影响,加之美国拉美学界在国际拉美学界的统御性影响,拉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美国对拉美的研究,美国学界及政策界在拉美的影响力在短期内未见衰退的可能。从学者到研究机构、从大学到私立基金会,美国在拉美研究学界的各方面都保持着持续的活跃状态。尽管美国的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拉美研究的发展,其主导作用难以规避自身的立场。早在1966年,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El 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CLACSO)奠基人之一、哥伦比亚社会学家奥兰多·法斯·波尔达(Orlando Fals-Borda)在一次题为《北美拉美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偏见》的演讲中,就着重指出美国的学术偏见对拉美研究发展的辩证影响。^②直到今天,拉美研究学界已经发展成为多学科、跨地区乃至全球化的研究领域,仍面临同样的南北不平衡局面。厄瓜多尔印第安族学者希尔维亚·库西坎基(Silvia Cusicanqui)在2012年撰文,公开质疑美国精英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及其对拉美研究的“殖民”倾向、话语控制,呼吁在教育和研究领域“去殖民化”,呼吁印第安身份的研究者拒绝他者的强加之言,通过平等渠道发声。^③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美国的拉美研究是美国对拉美地区霸权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柱,是美国“后院”政策的一个学术景观。

在美国拉美学界主导国际拉美研究的强大压力下,不少拉美国家的学者打出“超越美国的拉美研究”的旗帜。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学者开始引领相对主义范式的地区研究,拉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动态,开始被包括美

^① John D. Martz,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25, No.1, 1990, pp. 67-86, 75.

^② Orlando Fals-Borda, "The Ideological Biases of North American Studying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Christian Movement Speech, December 2nd, 1966.

^③ Silvia Rivera Cusicanqui, "A Reflection on the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of Decolonizatio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Vol.111, No.1, 2012, pp. 95-109.

国拉美学界在内的国际拉美学界愈加重视，这与北美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活动和民主有关。更重要的是，拉丁美洲在 20 世纪后半叶的经历，似乎成为学术理论的试验场，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度，激起了国际学界的学术好奇。一个接一个主流理论在拉丁美洲的推行与失效，更是迫切地要求学界的反思。美国与拉美各国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结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中运用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因此，为了更大程度地保持独立和批判，拉美研究必须认清并克服这样的差异，从比如改革学术期刊这样的具体措施上，平衡多方立场，客观地呈现更为多元的研究，学术期刊创新的例子有《拉美视角》(*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在传播上的例子是始于 1967 年的《美洲报告》(*Report on the Americas*)，由独立的非营利组织北美洲拉美议会(North American Congress on Latin America, NACLA)发布，目标是从第三方角度提供美洲内部南北关系相关的各种资料，供教育与社会倡议之用。

尽管意识形态偏见是美国拉美政治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学术社群得以在通识储备、理论建设、政策网络及国际合作上取得丰硕成果是不争事实，一个重要原因是建立了系统的机构间合作机制框架，从制度、资金上对拉美研究的开展提供全方位支持。机构间合作框架包括政府对高校的直接资助及政府牵头的国际合作项目、由三大私人基金会单独资助的各类用以支持研究的资助项目，以及各高校拉美研究中心与智库、基金会等众多非政府组织建立的长期伙伴关系网络。此外，除专业性的拉美研究领域研究与合作外，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及更广泛受众的系统语言培训、拉美文化和历史知识的推介，拓宽了拉美研究的社会影响，对学科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政府对拉美研究学科建设的支持表现在对各高校拉美研究中心的直接资助。美国政府对高校拓展拉美研究的资助项目直接促进了战后拉美研究作为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兴起，20 世纪 80 年代中美洲革命运动刺激了新一轮对拉美研究的资金支持。然而，现实政治动力驱动下的政府支持表现出明确的倾向性，对基础性学科的拉美研究则相对不够重视，冷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地区的战略意义进一步削减，拉美研究所得到的政府直接的资金支持也在逐渐减少。尽管如此，政府对高校拉美研究项目的直接资助仍是支持该领域发展的动力之一。2018 年，美国教育部通过本科国际研究项目和外语教学项目对康奈尔大学提供了拉美研究项目的专项资助，包括学校匹配额度在内共计将提供近

70 万美元的资金,用以推动拉美研究的教学和研究工作。^① 直接资助的另一方式是设立国家资源中心(National Resource Center),一期为四年并由教育部直接拨款,如哥伦比亚大学和范德比尔特大学 2014 年至 2018 年均被列为国家资源中心,^②后者于 2018 年被延长资助,将获得教育部超过 160 万美元的直接资助。^③ 此外,政府对高校拉美研究开展的支持还包括牵头建立双边教育合作框架,如美国—巴西高等教育倡议,包含了针对教师、学生、高等教育机构等不同对象的近 20 种项目,针对性强并覆盖广泛的双边合作倡议对促进国际交流提供了直接助力。

随着政府直接资助的逐渐递减,大学和研究机构不得不拓宽资金来源。这方面,私人基金会起到重要作用。在拉美研究领域,最突出的三大私人基金会分别为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廷克基金会(Tinker Foundation)和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其中,福特基金会在拉丁美洲工作已经超过 50 年,在墨西哥墨城、巴西里约热内卢和智利圣地亚哥设有办事处。自 1962 年以来,福特基金会在拉美地区投入了超过 10 亿美元,支持促进社会正义、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会。^④ 早期拉美研究相关的资助项目注重特定学科的人才培养,如 1965 年对芝加哥大学提供 40 万美元资助用以进行经济学学科内针对拉美经济困境的学术训练。^⑤ 初期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大学还包括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及洛杉矶分校,资助目标是拓宽拉丁美洲相关的国际议题的教学研究,以增强高水平人才在海外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⑥ 同时,福特基金会从早期便持续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等非政府智库机构,用以调研拉美国家的政治发展及大众媒体话题。^⑦ 除政治经济的社会科学话题外,福特基金会也对美国历史学协会提供以拉美史为课题的专项基金。福特基金会对拉美研究领域的资助与支持是最突出的,此外,近年来活跃

① <https://as.cornell.edu/news/grant-expands-undergrad-offerings-latin-america-and-caribbean>, 2019-06-14.

② <http://ilas.columbia.edu/academics/cu-nyu-consortium/>, 2019-06-14.

③ <https://news.vanderbilt.edu/2018/08/27/1-6-million-grant-renews-center-for-latin-american-studies-designation-as-national-resource-center/>, 2019-06-14.

④ <https://www.fordfoundation.org/the-latest/ford-live-events/50-years-of-change-in-latin-america/>, 2019-06-14.

⑤ “The Ford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65,” <https://www.fordfoundation.org/media/2435/1965-annual-report.pdf>, p. 29, 2019-06-14.

⑥ Ibid., p. 34.

⑦ Ibid., p. 44.

的基金会还包括廷克基金会,比如其在设有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的大学,为研究生提供田野调查的旅行补助和研究资金(Tinker Field Research Grant)。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获准得到该类资金的学生不需要在拉美地区有任何先前的实地经验,这类项目的目标正是为研究生提供获得语言文化综合知识的初次机会,并要求大学研究中心无条件等额匹配。廷克基金会的选择标准中强调拉美研究课程中的研究生课程质量,以及研究项目是否能够直接促进相应学科在地区知识上的进步。

在政府直接资助以及各类基金会的慷慨支持下,学界建立起了以各高校拉美研究中心为主体的研究网络,除各个拉美研究项目及研究中心的本职工作外,该研究网络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大学与各类非政府组织建立的长期伙伴关系。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拉丁美洲公众舆论项目(LAPOP),这个项目由范德比尔特大学主持,运行已超过20年,为拉美研究学界提供了大量资源的研究类项目。“拉美晴雨表”(Latino barómetro)是该项目最重要的成果,这是一项已被广泛熟知的对拉美社会进行全面舆论调查的计划。通过在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进行多年民意调查的积累,“拉美晴雨表”已经开发出关于拉美各国政治观点的舆论信息数据库,不仅在学术领域为各类教学与研究项目提供支持,也被各类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用于分析和报告。比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泛美发展银行(IDB),世界银行(WB),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等,同时还为拉美国家的政府提供参考。^① 这些合作关系直接加强了高校拉美研究的能力建设。能力建设是地区研究类项目的核心竞争力,通过高等教育机构与各类智库建立起的广泛合作关系,从本科生到研究生都可能有机会在调查研究设计、撰写分析报告的各个方面获得实践经验。此外,高校与社区及基础教育机构的合作也进一步扩大了拉丁美洲相关知识普及的覆盖范围。比如,政府直接资助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国家资源中心,在此资金支持下与纽约市拉美研究联盟(NYC-CLAS)建立全面的合作计划,形成了高校与广泛的社会机构建立合作的有效模式。^② 一方面,国家资源中心的资金针对创新型培训项目,以覆盖与国别研究需求直接相关的需求,尤其是非常用语言的研究与传播工作,这一部分主要针对拉美研究中心的工作重点;另一方面,哥大拉美研究

① <https://www.vanderbilt.edu/lapop/history.php>, 2019-06-14.

② <http://ilas.columbia.edu/academics/cu-nyu-consortium/>, 2019-06-14.

中心同时与校内相关院系和社区大学等机构合作,建设公共图书馆资源以及向 K-12 推广的外联方案,推动中等教育群体和广大公众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了解和理解。

总的来看,美国的拉美研究社群的确对国际拉美研究学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在学术研究网络以及合作机制运行上的经验也值得借鉴。通过梳理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范式演进及其中的进步之处可以看到,地区研究的发展核心在于建立并不断完善一个活跃的学术网络,在跨学科、跨机构的长足合作的支持下,将拉美研究领域的成果及其影响力拓宽至更广泛的社会受众群体。然而,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也面临结构性瓶颈,即在学术上拉美研究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重要分支被完全纳入了美国全球战略和社会科学的轨道。尽管理论成果丰富,但其并没有充分体现拉美国家政治发展的文化自主性,而是表现出学术殖民化的倾向即美国在政治上与外交上将拉美当作自身后院的立场。拉美国家的政治研究一定程度上被统合成为美国学术史的一部分,而作为独立议题领域的发展则相应受到限制。

四、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启示

从覆盖的历史长度、话题种类和学科数量上来看,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多样性和同质性并存的景观极大促进了国际拉美研究学界的发展,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被认为是检验美国政治学界之宏大理论的“天然的实验室”。^① 加强和推进拉美研究,需要积极借鉴包括美国拉美学界在内的众多国家拉美研究的学术智慧和研究经验,确立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精准定位,自成一家的拉美学术研究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一方面,作为拉美研究的后来者,中国的拉美研究需要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积极融入国际拉美学界的主流学术社群,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尤其是开展与已有拉美理论的对话交流,在交流中缩小与国际学界的差距,提升拉美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另一方面,拉美研究也要精准定位,与国际拉美学界保持一定距离,客观中立地看待拉美地区的社会现象,努力摆脱其他拉美研究主流理论的束缚,

^① 陆楠楠、苏毓淞:《作为可传授知识的拉丁美洲研究:比较观察》,《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5—23页。

积极构建自成一家的拉美研究。具体来说,开创与美国拉美研究不一样的拉美研究,学界需要重视从以下几个方面不懈努力。

(一) 在研究范式上,拉美政治研究要平衡特殊主义视角和普遍主义视角的关系,推进中道研究

普遍主义视角和特殊主义视角的论争,是拉美地区国别研究长期存在的一个学术现象。为什么会有拉美研究?最初是语言学意义的概念,后来演化到人文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就拉美政治研究来说,核心是要回答拉美政治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不是“拉美例外论”的话)。也许有很大的特殊性,也许没有特殊性。拉美研究要平衡普遍主义视角和特殊主义视角,努力走中道研究之路,重视吸取国家之长,融会贯通。首先,拉美研究有一个国别视角的问题,国别视角本身就是特殊的,拉美研究的他国视角意味着更多会聚焦他国学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他国与拉美国家的比较研究、双边关系研究,拉美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和作为研究等,在这些议题区域研究毫无疑问将做出重要贡献;其次,拉美研究也不能忽视普遍主义的研究,尤其是在对于理解拉美历史和文明基础具有重要价值的领域,比如印第安人的组织历史和政治文化、拉美社会中存在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等。区域与国别研究原本就是以“他者”研究为支柱的,对“他者”认知的关键在于真正洞悉拉美国家的普遍逻辑与特殊文化,故而平衡普遍主义的研究和特殊主义的研究,对推进拉美研究的发展尤为重要,有助于形成“不一样的拉美研究”。

(二) 在研究选题上,拉美政治研究要平衡拉美学理研究与拉美政策,重视加强有理论使命的政策研究和有实践感的学理研究

任何研究都是受到现实需要推动的,美国拉美研究的崛起最初也是服务于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需求,古巴革命的胜利更是直接刺激了美国拉美研究的兴起。时下,拉美研究一方面表现出“资政”或“资商”的目的,无论是推进双边合作,还是深化国际发展,都迫切要求加强有拉美实践研究。若干拉美研究中心及相关智库的兴起,贡献了大量研究课题和研究报告,构建起了围绕某一政策的多学科领域专家合作共进的网路,在对话中推进拉美研究的发展,这些努力对服务政策制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此同时,拉美研究应当加强学理研究,任何学科的学理研究都有价值,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历史、文学、语言和文化等人文学科。学理研

究意味着提供一些经得起学术检验和历史检验的研究发现。在加强学理研究中,既要鼓励各个学科推进学科内的拉美研究,又要鼓励拉美研究的跨学科对话,推动学科交叉渗透、融合发展。地区研究是跨学科综合研究的理想试验田,拉美研究应在跨学科合作的趋势之中开拓新的空间。区域研究离开了学科支撑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除非建立起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拉美区域研究机制,否则将不利于拉美研究的长足发展。相比单独建立系所的形式,从事拉美学理研究的学者更应该回落到基础学科的院系,通过融入基础学科的母系来推动拉美研究向纵深发展。

(三) 在研究方法上,拉美政治研究要平衡解释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拉美研究作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并不排斥任何一种研究方法,也不特别尊崇某一类研究方法,目标是推进针对区域与国别的学理研究。拉美研究在方法上应当平衡描述性研究的利弊:一方面,对于地区研究尤其是国别研究,打破语言壁垒而开展的深入的描述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另一方面,过于偏重描述性研究、形势报告和政策评论,则缺乏有深度的学理贡献。解释性研究是一种依靠已有理论工具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研究,它要么证实已有理论的正确,要么证伪已有理论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无论是描述性研究,还是解释性研究,都属于学理研究,都对方法论有着很高的要求。描述性研究对档案资料、信息情报和田野调查等有着很高的要求,而在解释性研究中,定量模型、回归分析、R语言等一些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广泛运用的方法和工具,也应该在拉美研究中得到加强。

(四) 在研究路径上,拉美政治研究要平衡“拉美研究”和“对拉美的研究”

在拉美学界,对拉美研究也有着不同的理解。粗略归类,拉美地区的学者倾向于偏重对拉美特性的内向研究,强调理解拉美地区的语言、文化、历史、族群等文化特性的“拉美研究”(Latin America Studies),是一个旨在从更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解拉美美洲的跨学科领域。而其他国家的拉美研究则更多体现为一种“对拉美的研究”(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较易倾向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带有策论意义的综合研究,核心是为本国如何同拉美国家处理关系提供战略参考。其实,两种类型的拉美研究各有其合理之处,拉美研究要注意平衡“拉美研究”和“对拉美的研究”两条路径,在全面深化拉美研究的学术

研究领域的同时，为推进中拉关系发展提供学术助力。

“对拉美的研究”路径加强拉美地区各国内部的国别研究和比较国别研究。拉丁美洲的多样化程度高，包括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相互间地理特征、基本国情和社会景观千差万别。“对拉美的研究”首先意味着对拉美各国进行翔实深入的国别研究/比较国别研究，只有对这些国家内部的情况分别有深入研究，对拉美地区各国之间展开全面的比较研究，才能从整体上理解拉美地区的文化特质。

“拉美研究”路径要求推进拉美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比较地区研究。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加强对拉美内部国别研究和比较国别研究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加强拉美研究与北美研究、亚洲研究、中东研究、欧亚研究、和非洲研究之间的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拉美地区背后的普遍规律和地区特色的理解。此外，欧洲的拉美研究、东亚的拉美研究，以及世界各地的拉美研究也在迅速崛起，拉美研究朝着美国的拉美研究与非美国的拉美研究日益平衡的方向发展。

总之，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带来的启示中，最需要警惕的误区是先入为主的价值观念，其次是对拉美国别历史中的特殊性缺乏重视、从而对现实发展形成误判，最后是应当充分在全球化语境下考察拉美国国家政治制度的发展，重视外来因素及拉美区域间合作对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这是拉美研究值得汲取的教训。